

在全民族抗战史中重新看见华南

《华南抗日根据地史》的书写方法

□ 左双文 梁晓欣

抗战的研究,尽管有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乃至华南抗日根据地等说法,但相关概念和范围却没有得以界定或厘清。由此形成一个突出问题:即事实上有华南敌后战场、学界也有根据地的说法,但长期以来,既没有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史的专著,更遑论完整的华南抗日根据地史专著。

鉴于学界研究的不足,本书遂从“华南”和“根据地”两个核心概念界定入手,认为华南抗日根据地是对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华南地区所创建的多块抗日根据地的总称。从历史空间看,包含民国时期广东省、福建省闽西南南区、香港地区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从当代行政区划看,以广东省和原属广东的海南省为核心,同时包含福建省闽西南南区、香港地区以及今属广西的原广东“钦廉四属”地区。在数量上,明确了华南抗日根据地包括东江抗日根据地、珠江抗日根据地、闽西南潮梅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港九抗日根据地、南路抗日根据地、中区抗日根据地、西江抗日根据地和北江抗日根据地等9块;而每一块抗日根据地,又是由若干块根据地或游击区所组成。

以往关于根据地的研究,若简单套用某一行政标准,往往难以完全解释复杂的历史实际。如以1979年民政部、财政部为革命老区免税而划定的根据地标准,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坚持武装斗争一年以上作为划分依据,不仅华南除东江、琼崖以外的其余9块根据地被排除在外,也显然与中共华南抗战史实相背离。针对这一核心问题,有必要回到根据地史研究本身,在充分吸纳20世纪80年代学界认定标准,即要有人民的军队、公开的抗日民主政权,将群众组织起来三要素的基础上,本书划定了华南地区9块抗日根据地,同时界定了游击区、游击基地和抗战支点(基点)等概念,认为“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支点、游击基地、游击区发展壮大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到,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阶梯式上升的历史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成型形态。概念和范围厘清之后,也就为系统书写华南抗日根据地史奠定了基点。

叙事:转向根据地建设

或许是由于史料缺乏等缘故,长期以来,抗日根据地史书写极易陷入单纯的军队史、武装斗争史的叙事窠臼。事实上,抗日根据地史的书写核心,应该是根据地的开辟、发展与建设,必须围绕党政军群的发展展开多维考察。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没有伟大的武装与伟大的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显然,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把这两者的关系写清楚,才能写好根据地史。

在具体书写中,其叙述方法,是“以战争形势为背景,以时间推进为经、以区域根据地地为纬、以根据地建设为中心”的叙事方法。全书共5章,第一章“日本对华南的侵略和中共在华南的抗日准备”作为背景;其余4章分时段、分地区梳理华南地区9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历程。这一结构安排,是试图把分散在广东、海南、闽西南、香港以及钦廉地区的多块根据地,放入同一个历史进程中理解。

除港九抗日根据地因香港沦陷后的特殊历史环境而单列一章外,其他部分大体按照1938年10月至1940年、1941年至1943年、1944年至1945年9月三个阶段展开。每一阶段之中,再分别考察东江、珠江、琼崖、闽西南潮梅、南路、中区、西江、北江等根据地或游击区的历史变化。这样写,是为了避免把华南抗日根据地处理成若干互不相连的地方叙事,而是呈现其在全民族抗战进程中的生成、巩固和扩展。

在每一块根据地内部,叙述也尽量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首先写武装斗争,因为敌后游击战是根据地开辟的前提;其次写根据地的时空范围及其变化,因为华南根据地往往具有分散性、流动性和不平衡性;最后写根据地建设,包括抗日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民运、党建、军事、统战、交通、情报、宣传、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就是说,武装斗争是背景和支撑,根据地建设才是根据地史书写的重心。

例如,东江抗日根据地史不能只写

曾生、王作尧等领导的抗日武装如何作战,还要写大岭山、阳台山、惠宝边等根据地如何形成、发展壮大的,税收、交通、统战和群众工作等如何支撑敌后斗争。琼崖抗日根据地史也不能只写独立总队、琼崖纵队的军事行动,还要写琼文、美合、六连岭、五指山等根据地的开辟和曲折发展,写抗日民主政权、华侨回乡服务团等是如何进行根据地建设的。由此可见,只有把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华南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和建设华南抗日根据地的艰辛历程。

路径:深挖多源史料

华南抗日根据地地处南方沿海、岛屿、河流地带、丘陵山区和各省边区,受战时交通阻隔、敌伪封锁和斗争环境影响,一些根据地如琼崖、南路、闽西南潮梅等曾一度与上级组织联络不畅;加上战时条件困难、斗争环境恶劣,党政运作高度隐蔽等原因,官方档案留存相对匮乏,地方史料和民间史料又比较零散,要系统全面地呈现华南抗日根据地史,难度很大。

面对这一困境,作者在研究中逐渐认识到:新材料固然重要,但不是史学创新的唯一路径。许多早已公开的革命历史文献、地方文史资料和亲历者回忆等,只要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重新梳理、相互参照、反复考辨,同样能“淘炼”出极具价值的研究选题,同样能在相当程度上还原历史的本来样貌。所谓“存量史料”,并不等于已穷尽其意义,关键在于能否在既有材料之间建立新的问题关联。

《华南抗日根据地史》的撰写,正是在充分利用多源史料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些史料包括《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核心档案汇编、国民党和日伪档案资料、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等抗日武装的专题史料、各省市党政军群组织史料、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以及曾生、王作尧、杨廉华、郭强、李征、冯白驹、庄田、罗文洪、李英敏、谢立全、刘向东、刘田夫、刘永生等亲历者的回忆录或日记。

不同来源的史料各有立场、层次和局限,只有经过互证、辨析和取舍,才能成为根据地史书写的可靠支撑。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具体史实得以进一步厘清,并产生新知。

例如,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香港秘密大营救”,是在香港岛的廖承志派廖安祥联系在九龙的尹林平后才打通香港沦陷后港九间党的联系的;廖安祥并非仅仅是爱国商人,而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秘密交通员、1937年参加革命的“自己人”;营救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知名文化界人士人数,在200人左右,并非以往研究认为的300多人或800多人,甚至千人以上。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回乡从事抗日救亡的人数为220人左右,并非最初组团时的240人。琼崖独立总队改编为琼崖纵队的时间是1944年9月,改编的依据应该是南方局的相关指示。类似关于时间、地点、人物、数字和事件关系的辨析,虽然看似细微,却直接关系到华南抗日根据地史叙述的准确性。

因此,华南抗日根据地史的书写,不只是材料的铺陈,更是一个在纷繁零散的史料中发现问题意识、辨析历史事实、重建历史关联的过程。所谓“看见”,并不是说此前没有研究积累,而是在既有部队史、地方史和专题研究基础上,将分散的地方经验纳入全民族抗战史的整体叙事之中。

重新认识华南抗日根据地,是为了更完整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历史进程。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和建设,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华南军民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战、组织群众、建设根据地的历史实践,也为区域抗战史研究和根据地史书写提供了重要启示。把这段历史写清楚,就是把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图景写得更加完整。

就目前所见,《华南抗日根据地史》也是学界第一次对华南抗日根据地历史作系统叙述的尝试,填补了该区域根据地专题研究的空白,为中共华南抗战研究领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

(作者左双文系广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梁晓欣系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闽粤互移期共赏

——荔枝种植传播史的佳话

□ 周松芳

晚了。传入的确切时间,诸家说法不一,迄无定论,我们也姑且不论,因为本文的重点是考察具体品种的相互移栽情形,探讨如何共襄荔枝成为果王之盛举,实在是荔枝移植传播史的佳话。

“尚书怀”荔枝的广东史

“尚书怀”之可注意,正在于它既被视为福建移栽广东的著名品种,又在后世文献中屡屡引发名实之辨。所谓“尚书怀”,究竟是一种荔枝,还是若干荔枝的总称?从屈大均以至近世诸家,所说并不一致。正因如此,它成为考察闽粤荔枝品种流动与名称变迁的一个重要例证。

最早记载尚书怀移栽广东的是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与小华山、绿罗衣、交几环三种皆绝美,是皆火山之属,湛文简公昔从枫亭怀核以归,所谓尚书怀者也。”并无优劣评价。其《广州荔枝词》则只当其大路货,并自注曰,因湛若水从闽之枫亭怀核以归、种于沙贝而得名。值得注意的是,屈大均笔下的尚书怀已经不是一种,而是数种的合称——他在《广东新语》“龙眼条”又注:“盖市中所贩,大抵状元红、小华山诸种,皆火山之属,所谓尚书怀者也。”直到晚近,广州学者王亨之仍持此说:怀核分“小华山”“绿罗衣”“交几环”三品,因湛甘泉官至尚书,故名“尚书怀”,只是三种的具体所指,较屈大均时代已略有出入。

问题是,从屈大均到王亨之,这三百多年间,又有太多文献把尚书怀视为一种荔枝;至于它是否包括挂绿、十八娘等名品,各家说法亦多出入。这一名实之间的反复,正说明荔枝品种之考辨,不能仅据品名,仍须辨其所指之种、所出之地与所据之文献。研究文学,辨体很重要,研究荔枝,辨种很重要。

王焜(1651—1726)《离支词》说:“初秋正熟尚书怀,风味居然迈等侪。可怪同时生挂绿,从来瑑亮本难侪。”评价颇高,几与挂绿并提,且当作一种。稍后陈大章(1659—1727)《初食荔枝》却说:“尚书移植多殊种,更有黄家十八娘。”又认为是总称,连十八娘也算进去。全祖望(1705—1755)《增城荔枝》更云“新州香荔已堪推,挂绿东来更绝佳。况有嘉名以

义重,当年曾入尚书怀”,连挂绿都纳入。

到嘉道年间,仍无定说。比如在原籍绍兴生长广州的史善长(1768—1830),他的《新增荔枝词》说:“颗颗明珠缀碧钗,攀枝小据风头鞋。郎行自摘红娘子,几家只啖尚书怀(红娘子、尚书怀,皆荔枝名)。”尚书怀与红娘子对举,显然是当做一种。但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增城县志》则沿屈说视为总称。

所奇怪的是,两年后即道光二年(1822)刊刻的两广总督阮元所修《广东通志》,又把尚书怀单列为一种:“……小华山、绿罗衣(壳淡绿微红)、交几环、素馨、露花、丁香(小华山以下皆绝美之品);尚书怀(昔传明湛若水从枫亭怀核归种于西樵)。”这里还增加了一个种植地西樵,也正常,因湛若水在此建有书院。稍后谭莹(1800—1871)的《乐志堂诗集》(清咸丰十年史隐园刻本)卷一《岭南荔枝词》中有首曰:“黛叶细枝品自佳,年来闽粤爱相排。岭南亦有枫亭种,道是尚书旧日怀。”显然又打回总称。此后清光绪五年刊《广州府志》、民国十年刻《增城县志》均沿屈说。

晚近以来,“尚书怀”则日益趋于单一品种,名称也渐渐省去“尚书”官衔,而简化为“怀核”。

光绪《四会县志》说:“尚书怀最后熟,逊黑叶远甚”,已把它从传统所属的火山种里区别出来,成了别一种。陈伯陶《东莞县志》(民国十年铅印本)亦云“怀核最熟,即增城尚书怀种”。到民国两大食神江孔殷与谭延闿笔下,怀核也都成了迟熟品种,江孔殷《荔枝词》称“怀核七月熟嫌迟”,谭延闿1923年日记亦记,“至槐黄出则荔枝事尽矣”。

行文至此,尚有一疑不能不说:尚书怀究竟与湛若水有无关系?恐怕难以定论——遍检湛若水文集,无一言及于荔枝,多半是后人冒其名尔。

但闽粤回传岭南,则可肯定。除尚书怀外,十八娘也是闽种,只是是否归入“尚书怀”,各家依旧不一;陈大章视为一类,王焜《离支词》则未作如是观:“闻道黄家十八娘,翠裙红袖美如人。罗裙解心先醉,不是寻常脂粉香。此闽种最佳者,闻而知之,未及亲尝。”

宣统《高要县志》另载“周绍玉”一种,亦相传是周绍玉宦于闽而移种归植,与尚书怀托名如出一辙——只是尚

书怀假托的可能更大,因湛若水名气更响。要之,闽荔回传岭南是真;至于岭南荔枝传入闽中,最典型者,当属火山荔枝。

火山荔枝的闽传

火山荔枝的移传,恰可与“尚书怀”互为参看,而方向相反——它由梧州(今属广西)传入福建。其入闽以后,品评颇不一致:或以早熟见珍,或以味酸肉薄见贬;而回到岭南文献中,又有单品与类名之别。其间名实与品第之歧互,正是下文所要考察的。

火山荔枝原产梧州。乾隆《梧州府志》卷三说蔡襄《荔枝谱》于闽产外独记火山一种,不过本之唐人段公路《北户录》:“梧州火山者,唐初先熟而味小劣,其高、潘州者最佳。”唐刘恂《岭表录异》亦谓其地荔枝“四月先熟,以其地热,故为火山也”;其名之由来,原有“其火每三五夜一见于山顶”“或言其下有宝珠,光照于上,如火”之说——山名本出自传说。

至于说火山荔枝的味道较差,不可一概而论,或可依地气而不同,晚清丁日昌为它辩护:“火山先熟味少劣,公路所言吾不究”;蔡襄《荔枝谱》说它:“火山本出广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杷,闽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因其中初传闽中,固可信,但后来也有认为味道尚佳的,如清初福建人林嗣环《荔枝话》把它列为泉州知名佳荔。

从北宋迄于民初,一千多年的记述中,火山荔枝的品味可谓优劣互现。最能显示这种优劣互现的,是明代福州文人对火山荔枝的不同书写:诗中每有赏爱之辞,谱录中却多见酸薄之评。

明代后期福州著名学者谢肇淛和其同乡好友徐兴公,在隔代唱和诗中,对火山荔枝赞誉有加,徐兴公甚至称其为“别有一种尤珍奇”,借诗表明“栽种宜推老圃中”“得食岂必论先后”“吾侪爱嗜同沉湎,俗辈忌食宁流涎”——表示不顾俗辈讥嘲,就是敢于爱嗜。

确实,明代的文人骚客们更多的是“唱衰”火山荔枝。即如徐兴公,在私下唱和诗中可以赞赏火山荔枝,而在谱录

文字中则仍示其酸薄:“福州品:火山……肉薄味酸,四月熟,品最下……”——私下抒情与公开谱录,判然两途。而邓原岳《荔枝曲十四首》更直斥其“酸齿齿牙形味劣,果中比作扫除人”。

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如此,福建人为何要引进这样一个“品质低下”的荔枝?只因其早熟?相对的,尚书怀在广东也不见佳,为什么湛若水还要归?是否有一种可能——这些品种当初引进时相对并不逊色,是后来不断有新品种实生变异而出,才相形见绌——就像挂绿、糯米糍、桂味这些今日名品,大都出现在湛若水的时代之后。

火山荔枝在岭南文献中也呈现出名实游移的情形:它有时被视为一种具体荔枝,有时又被扩展为“山枝”一类。屈大均既称状元红、小华山等“皆火山之属,所谓尚书怀者也”,又说“自挂绿至状元红皆山枝火山之属”,并称火山“善变,滋味百出,随其土为高下”。后人亦有将岭南荔枝分为“水枝”与“火山”两大类者,几乎以火山概括夏至后成熟的荔枝。

更复杂的是,火山在福建文献中多被视为早熟品种,而在岭南文献中却又被记为迟熟。吴应逢《岭南荔枝谱》一处引黄佐《广东通志》称“五月后迟熟而小者名火山”,又疏注谓“荔枝将尽而后有火山,其熟最迟”;另一处则引说“自夏至后熟者皆山枝,亦曰火山”。由此可见,“火山”一名在岭南既有单品之义,又有类名之义,成熟期、品第与所指范围均不稳定。

总而言之,如此多的歧互与矛盾,反映出历史上对荔枝品种的观察记录确有粗率之处,也为荔枝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据现代植物学,荔枝核脱离果实五日即失去发芽能力,则湛若水“怀核以归”一说,于技术上难以成立;但闽荔回移粤土,则仍可肯定。至于其移植究竟以何种方式进行,是否出自湛氏亲手,又当别论。名实虽聚讼难定,移植则实有其事。无论如何,此类闽粤之间的相互移植,在特定阶段促进了两地荔枝品种的改善与发展,也为荔枝维持“果王”声誉,贡献了各自的精彩。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羊城晚报

A6

理论

文史哲

2026年7月10日

星期五

责编 潘玮倩

美编 张江

校对 姚毅

开卷小识

今天这一版周刊上的两篇文章,精彩之处,不仅在标题。

左双文、梁晓欣一文,评述游海华的《华南抗日根据地史》,分享的是一种研究和书写历史的方法。我们熟悉战争,却未必真正熟悉战争背后的根据地:一块根据地,是怎样形成、怎样组织群众、怎样维系、又怎样一点一点支撑起敌后抗战的?

历史当然发生在战场,但是,也发生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建设里。

周松芳写荔枝,是个中行家,而您读着读着,或许会忍不住莞尔。是因为荔枝吗?不,是因为古人。作者面对一堆古籍,把一个看似混乱的问题追到底,最后发现——

混乱本身,原来竟就是历史。

一个“尚书怀”,有人说是一种荔枝,有人说是一类荔枝。一个“火山荔枝”,有人说它最好,有人嫌它最差;在福建,它被说成早熟,到了岭南,怎么又成了晚熟?几颗荔枝,身世竟如此之“谜”。

两篇文章,内容看似相去甚远,却都让人生起一种隐约的同感:好的历史研究,不只是告诉我们答案,更会让我们重新发现问题。而真正有意思的阅读,也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祝您本周阅读愉快!

(编者)

